

「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」紀實

記錄整理／林芸伊 公共服務組

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2010年10月17日下午3點半，台灣文學館七週年館慶暨國民文化日系列活動之一「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」，在第一會議室盛大舉行。在李瑞騰館長的主持之下，陳芳明教授、廖咸浩教授、林柏維教授，針對台灣的文化及文學，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見解。台灣文化的特徵在哪裡？台灣的國民文學內涵又是什麼？且聽三位專家學者的對談，讓我們一同領略國民精神的意義。

李瑞騰（以下簡稱「李」）：今天是台灣文學館七週年館慶。1921年的10月17日，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，今天也是文化協會成立的紀念日。文學館特別在今天，安排了一場「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」，從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運動，來看看現代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國民文化的工作。今天的與談者有三位，陳芳明教授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所長，長期從事台灣文學的研究教學工作，也專長於左翼文學與政治活動；廖咸浩教授與陳芳明教授一樣，本質上都是詩人；廖教授長期在台大外文系擔任教職，也曾經做過台北市文化局局長；林柏維教授則任教於南台科技大學，學術論文寫台灣文化協會，是這方面的專家。我們今天特別邀請這三位特別來賓，來幫我們講一講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。

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的闡述

陳芳明（以下簡稱「陳」）：各位台南的鄉親好。

今天是10月17日，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79週年的日子，也是蔣渭水先生逝世紀念日，所以10月17日，已經成為台灣共同記憶的一天。今天早上我還在台北參加「第二屆蔣渭水學術研討會」，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研究台灣的歷史，我覺得非常興奮，研討會結束後，便又趕

來台灣文學館座談。台灣文化及台灣文學的研究，大概在近二十年來，才開始蓬勃發展。這是一個遲到的學問，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化，必須要等到那麼久以後，台灣解嚴了，威權體制瓦解了，才開始接觸我們自己先人的歷史。歷史是反覆的，是由民間創造改寫，進而建立起歷史觀，而不是由統治者寫的。我希望我的後人，以後在檔案中看到我的名字時，都能感到驕傲。身處歷史之中，我總感覺歷史的發展是非常慢的。我們所祈求的民主，現在在台灣，只完成了一小部分，等待我們去追求的，還有一個更完美的「公民社會」。民主只是一個基層的概念，我希望大家都能更進一步去關心社會的各種議題，如環保、性別、原住民等。以前的主流文化都是依附統治者的，我希望以後，每個人民都能享有發言權，不管你是什麼弱勢族群，都應該是屬於這塊土地的一部分。知識分子都應該勇於承擔社會責任，將台灣推向更精緻化，這才是今天的國民文化的真理所在。讓台灣每個人民享有相同的權利，是我的夢，但我想我這一輩子都無法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實現了，但我會盡我的全力盡力追求理想，讓真正的國民民主文化在未來能完成，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態度。1920年代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，只是



陳芳明教授



廖咸浩教授



林柏維教授

卑微的言論自由，而今天，公民的權利才是我們所應努力的目標。

廖咸浩（以下簡稱「廖」）：我把要講的主題拉回文學。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喪失做夢的能力，而文學的意義，便在這裡彰顯了。我念建中的時候，有一個同學對我說，他一直無法了解「太陽衝破烏雲」這句話的意思，因為他說太陽是光波，怎麼可能衝破烏雲？前陣子我參加一個研討會，會中有一句話是「用歡笑織成衣裳」，也有人說，歡笑又不是布，怎麼能織成衣裳呢？這兩個問題，我後來終於替他們找到解答了。原因就在他們不了解「比喻」。猴子看到花生只會去抓來吃，但人類卻能創造出「去天上摘星星」這樣的辭句。人類懂得「比喻」，一個人一旦喪失做夢的能力，他就不是人了。所謂做夢的能力，就是說一個人能跳脫他平面的生活、實際的生活、功利的的生活，去想像另外一個層次的可能性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了解「比喻」的能力。人類自從進入現代社會後，生活便被壓縮成扁平的，看不到未知的遠方，好像用爬的一樣，喪失了做夢的能力。「夢」與「比喻」是文學的起點。前面我講的那兩個人的問題，起因便在於人類自從進入科技生活之後，便好像又回到爬行的世界，無法站立看到遠方，無法看到另一個看不到的層

次的生活價值。陳芳明教授剛剛講他自己的夢想，是一個很難實現、很抽象的夢。猴子只會抓花生吃，只是很實用的能力，人類卻懂得夢想摘星星，擁有很抽象的想像。我認為這就是文學的功能所在。我們該如何衝破現代的功利理性生活，便須借助文學的力量。如何讓我們再度實踐、接觸文學，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時的著力點。

林柏維：1895年的台灣，因為馬關條約而成為日本的領土，台灣的歷史命運隨之轉折。日本政府的高壓專制統治，引發了台灣人民的武力流血抗爭。然而，日本殖民者的有效經營，最終化去了武力抗暴的外在條件，最終使得台灣與日本母國產生緊密的聯結。在殖民統治教育下，台灣的菁英分子都渡海日本進入日本的一流大學，而留在台灣的這些秀異分子，便以蔣渭水的文化公司為底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後，於1921年10月17日，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。文化協會的足跡遍及台灣各地，其中活動熱度以台中為最。它們設讀報社、推動白話文的使用、提倡新劇、組電影隊，企圖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、建設台灣的特種文化、提高台灣人的品格。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運動，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，也使1920年代台灣的社會空間起了發酵作用。然而，文

化啟蒙的周邊效應，卻也反映在因啟蒙而帶來的社會分化、思想分歧，從而產生路線爭議、派系歸屬，伏下分裂的種因。1927年，連溫卿領導新文化協會，改走階級鬥爭路線；而蔡培火、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，文化協會終告左右分流。1920年代文化協會風起雲湧的文化運動，在大正民主的場域中發展開來，蔚為波濤壯闊的巨流，在台灣歷史上實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景象。它成功地催化了台灣的新文化，樹立台灣人尊嚴的文化運動，不只是建構台灣本土文化的恢宏運動，也是告別唐山文化的里程碑。我們環顧今天的台灣，彷彿還患著蔣渭水「臨床講義」上所診斷的「智識營養不良症」，彷彿還是「世界文化的低能兒」。在紀念台灣文化啟蒙日的此時，林獻堂的呼籲：「要以改造的精神，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。」仍可做為我們再造台灣新文化的座右銘。

國民文化運動的分裂

陳：其實大家都在追求夢想。台灣文化運動最蓬勃的時候，大概是從1921年到1931年。很遺憾地，日據時代台灣人的抗爭運動，就是一段分裂史。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，強行將一些現代化的東西，如議會、日語，推行到台灣，致使1905年後，台灣開始出現不少的新世代知識分子，如賴和、蔡培火、蔣渭水，他們都想反抗日本的專制政治，推行台灣本土文化的革新。文化協會剛成立時，他們想的都是推動、提升、啟蒙台灣的文化，也負責各類新式報章雜誌的發行，讓民主、議會、人權知識快速傳播，有的人甚至因此入獄被關。但也因為文化協會的文化傳播，最後終於導致台灣農工階級

運動勃起，因而連帶使得文化協會內部產生了衝突分裂。1927年，關心農工問題的知識分子，成為了文化協會裡的左派；而關心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，則變成了所謂的右派。最後左派奪得權力，右派只得另立台灣民眾黨。台灣的抗爭運動，就是這樣不斷地分裂。不過這些知識分子都極為深入社會，他們都勇於反抗日本，推動台灣本土文化的啟蒙。後來像楊逵、呂赫若等人，也都跟著起來了。

廖：左右分裂這件事情，是第三世界國家，尤其是被殖民國家，它們在走向獨立的過程中，一定會經歷的。即使不是第三世界國家，也都會出現很激烈的左右對立。台灣當時的狀況，想在體制外爭奪權力，出現分裂便是必然的。但其實在一個成熟的社會，左右分裂不一定要是對立的，它們可以互相協調。文化協會的分裂，其實可以看成是眾聲喧嘩，雙方都應該在台灣社會裡彼此成長。一個社會要學會開放，才能經得起打擊。而文學作品的想像空間，便是一個衝突、合解、與共生的社會中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每個人如果都能透過文學作品學會想像，便容易彼此產生共識，達到共生的目標。文化協會生存的時代，便是因為還不夠成熟，才會產生那種嚴重的衝突。

李：在1920年代那樣一個匱乏的年代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，使得台灣文化的啟蒙，有了一個新的契機。而在今天，台灣的民主已經走到一個更高的狀態，我們的國民文化又該如何繼續提升？我們非常感謝今天，在文化協會成立79週年的這一天，邀請到三位教授來幫我們講一講台灣的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。謝謝大家的參與。✎